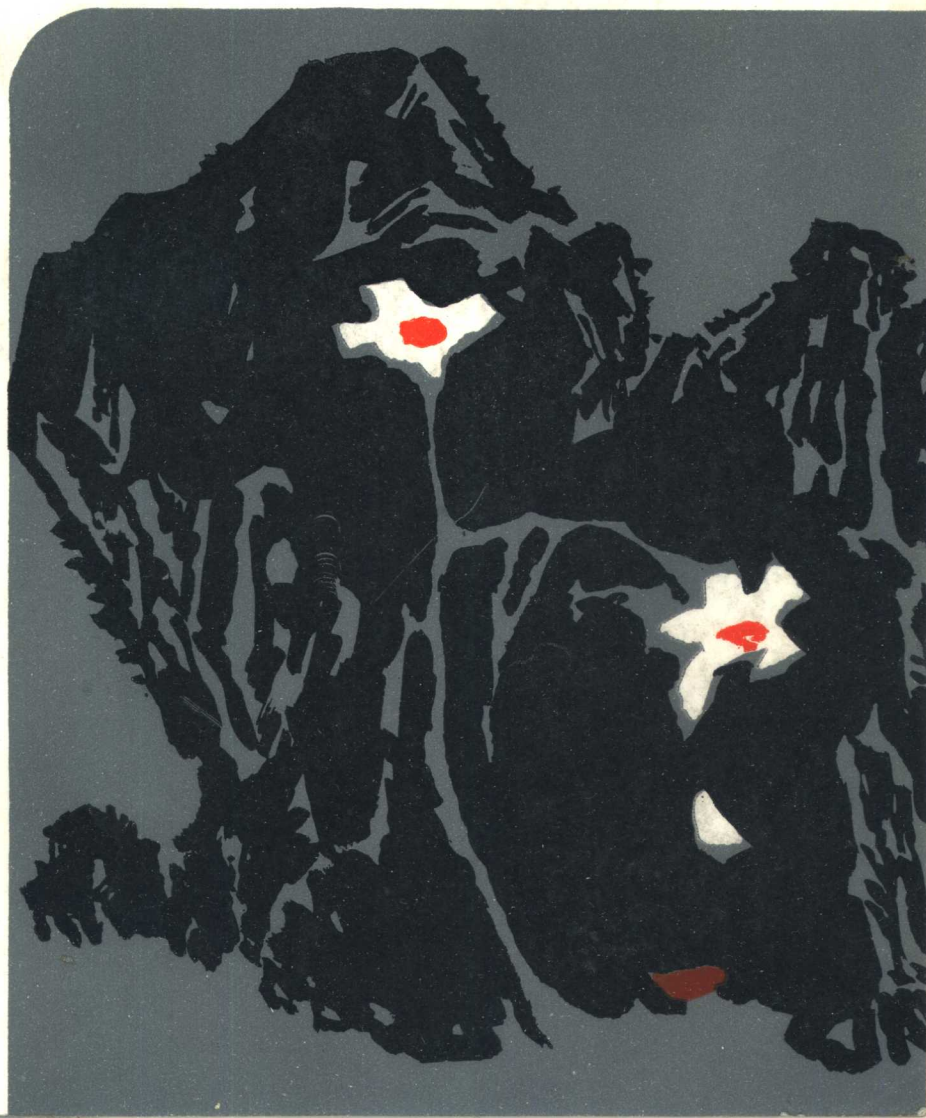


从 维 熙

花 折 路 驛

YILUZHETUA





2 034 9680 4

驿 路 折 花

从 维 熙



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

一 九 八 五 年 · 北 京

封面设计：于绍文

封面题字：古干

驿路折花

Yìlù Zhēhuā

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

(北京朝内大街166号)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

字数 359,000 开本 850×1168 毫米 $\frac{1}{32}$ 印张 $16\frac{1}{16}$ 插页 3

1985年8月北京第1版 1985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 00,001—25,500

书号 10019·3838

定价 3.10 元



作者像

题 序

应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之约，我从近几年发表的中篇小说中，筛选了几篇东西，编成了这个集子，以留下自己这几年文学的轨迹。

从某种意义上讲，这个选本中收集的东西，是我几年来有代表性的作品。书名所以称之为“驿路折花”，是因为它既囊括了我走过的艰辛道路，又包含了我在艺术上对真正浪漫主义孜孜不倦的追求。我折下带血的“红玉兰”，作为向泥泞历史的祭悼；我折下淡雅的“死不了”，作为对历史新时期的冀希。不，应当说我折下的不是一束束的花儿，而是留下炎黄子孙中一幅幅坚强跋涉者的肖像。

把这个集子命名为“驿路折花”，还有另一个原因：一九八二年我访澳归来途经香港时，一位女散文家曾向我建议：“你发表的《伞》和《燃烧的记忆》，副题上都标有‘驿路折花之一之二’的字样；‘驿路折花’这个词儿很有诗意，将来你能否用这四个字为题编一个集子？”

感谢她的提示。现在，我就把这个中篇选呈献给友人和读者。

作 者

一九八四年四月四日于京西宾馆

目 录

题 序	1
伞.....	1
大墙下的红玉兰.....	44
泥 泞	114
远去的白帆	240
雪落黄河静无声.....	335
白云飘落天幕.....	425

伞

我有一把伞。

它，既不是当代流行的折叠伞，也不是色彩绚丽的塑料伞，更不是巧夺天工的花边伞。它是一把涂着桐油，打着补丁的旧伞。

每逢京城落雨的日子，我撑着它上街办事，总是吸引来一片惊异的目光。去年夏天一个飘着蒙蒙细雨的早晨，我去某个文学期刊开会；在湿漉漉的柏油马路上，碰到一个很熟悉的老编辑，他看我撑着这把不入流的破伞，有点怪嗔地笑了：

“你是不是……”他斟酌了半天字眼，含蓄地说：“太‘那个’了一点？”

我理解“那个”的含意，不外是把我看成巴尔扎克笔下的吝啬鬼。尽管巴尔扎克笔下守财奴的形象，大都是银发稀疏的老头儿——而我并不具备那样的高龄，但漫漫驿路上的风霜雨雪，过早地湮没了我的青年时代，时间老人已经给我的前额刻上了几道深深的皱纹；再加上我头顶上这把破伞，似乎一只脚已踏进了老年人的门坎。在那些粉红、嫩绿、鸭嘴黄、孔雀蓝的伞群之中，犹如在五颜六色花圃中的一朵蘑菇，人家把你看成“那个”，也是十分合乎情理的事情。

“是不是先预支给你一点稿费？”他看我沉默不语，认为我是默认了“那个”的雅号，拍拍我的肩膀，友善地对我说。

“干什么？”我明知故问。

“换把伞！”

我笑了：“用你那把南方的折叠伞，来换我这把乡巴佬的桐油伞，我还不换呢！”

“有这么贵重？”

“当然！”我斜睨了老朋友一眼。

“能不能叫我认识一下它的价值？”

在霏霏细雨中，我向他谈起这把伞的记忆……



时间，还用问吗？当然是在中国大地上一片浑浊的年月。时代的强台风，象戏弄着离开母体的枯黄树叶一样，不知为了什么——也没有人告诉你为了什么——把我们席卷到了太行山脉的一个小小山村。

本来，我们这些劳教期满的摘帽右派，是没有资格和太行山的乡亲们住在一个院子里的；偏偏我在那个劳改煤矿，每间房子都吃得过饱超编，于是我们这些从京华发配晋阳的右派夫妻，便在监管之外的小村里落脚栖身。

我们的房东是个三十七、八岁的妇女，比我们年龄大一些，我们无权滥用“同志”这个字眼，便喊她“大嫂”。这是个盛产“千金”的家庭，大嫂膝下开了四朵花，名曰：改枝、改兰、改秀、改芬。当我们夫妻俩搬进院子紧贴西北角的小屋时，这四位“千金”俨然象一列女兵，站在墙根下，圆睁着一双双乌溜溜的大眼睛，审视着我们。特别是那位领头的姑娘改枝，微皱着两条柳叶眉，似乎在检查着我们行囊中是否藏有炸弹一样，手摸着长辫

梢，外凸着的杏核眼，在我们每件包裹上盯来盯去。

对于正常的人，这样的目光会激起对方的强烈反感；但对于我们来说，由于饱尝了各种刺激，早已麻木不仁，因而没有任何反应。但是我们怎么也没预料到，改枝对我们行“注目礼”，仅仅是个开端；在我们收拾这间小屋时，改枝蹬着一条长板凳，用白粉笔在黑门框上写上“欢迎”我们的一副对联。左联写：只许规矩矩；右联是：不许乱说乱动。横批：接受劳改。不知是姑娘文化水平的限制，还是因为书写对联时匆忙之故，竟将“接受劳改”中的“接”字误写成“结”字，又把“受”字，错写成了“束”字。尽管这两字之错，意思发生了根本颠倒，但我们并没有一点轻松，两个人都意识到这间小屋不过是“大墙”之外的牢房而已。

入夜，我俩躺在那张只有一米二宽的土炕上，久久地默默无言。山村之夜，静得出奇。这里既听不见津北茶淀农场苇塘中水鸟的叫声，也听不见水稻田里的蛙鸣；只有那盏如豆的油灯，上上下下舔着火舌，剩下的就是幽暗房子里蚊子的飞鸣声了——这是静静夏夜里的唯一音响。

“唉——”我长叹一口气。

“叹什么气？”她说。

“你看见那双杏核眼了吗？”

“看见了。”她说，“不过，我只当没看见，眼不见为净。”

“这是不是有点阿Q精神？”

“阿Q精神胜利法，有医治心律过速的作用。它可以叫你没有愤怒，没有悲哀，保持心脏正常。”

“你总是这么冷静！”我快快不快地说。

“对了。”她支起身子，反问我，“你不冷静，去把‘欢迎’对联擦去，行吗？”

这一军，“将”住了我，我无话可说了。

漫长的改造岁月中，我和她虽然都受着等同的压力；但对于压力的态度，却常常迥然不同。我爱动感情，而她却严于理性，就好像承受压力的不是她纤弱的身躯，而仅仅只是她的幽灵，她在任何情况下，都能保持着镇静自若，用含而不露的微笑，看待冷漠的现实。因此，在蚊子嗡嗡的俯冲声中，她摘下眼镜就睡着了。

我则辗转反侧难以成眠，我面前总出现那双凸出来的杏核眼。我想：这个姑娘够美的，唯一的缺陷，就是皱眉的时候，显得过于厉害，缺少一个农村姑娘应有的善良。我反复思考着门口的那副对联，一个姑娘家，有什么必要这样对待两个陌生的房客，真是有点太过分了。往后，还不定弄出什么新花样来呢！

门口似乎有了轻轻的脚步声，“嚓嚓嚓”地在门外停住了。最初，我想这是风吹落叶的声响；但我马上想到这是盛夏，树叶都滴青流翠地挂在树上，怎么会有落叶？！否定了第一个推测之后，第二个揣测本能地涌上心头：“这又是那个长着杏核眼的姑娘，听窗根来了。”想到这里，心里不禁升起一股怒火，便大声咳嗽两声，表示我对她的侦察，已经有所发觉，并用咳嗽声表示一种变相的抗议。

但是，我的抗议没发挥什么效果；相反，她竟然用手叩打我的房门了。

“已经睡了。”我饱含着怒气地说，“有什么事明天再指示！”

“给俺开开门，俺有事！”

我蹬上长裤，两步迈到门口，“哐啷”一声拉开插门棍，打开了门。

一轮圆月挂在中天，在清淡的月亮下，我又看到了那双杏核

眼；不过，这双眼睛里没有咄咄逼人的锋芒，而是满噙着忧郁和同情。原来，叩门的不是改枝，而是改枝娘——我们的房东大嫂。

她带着歉意地望着我，抖抖手中苦艾编成的蚊绳说：“俺怕蚊子咬得你们睡不着，给你们根熏蚊绳！”

我登时愣住了。

谁知道我妻子是什么时候醒过来的，她穿着短裤下了炕，接过蚊绳之后，攥住大嫂的手说：“大嫂！来屋里坐一会儿！”

“不，”她把垂落在耳边的一绺散发，按到耳根上，“你们睡吧！明儿个一早，你们还要去劳动哪！”

“来吧！我们不怕熬夜，大嫂！”我说。

她略略沉吟了一会儿，终于走进这间低矮的小屋里来。豆油灯重新点着了，燃烧的蚊绳发着一股苦艾的清香，房东大嫂安静地坐在炕沿上，打量着堆满了杂物的小屋，我则专注地凝视着她，拚命想从她的形象上透视她的灵魂。

她长着象改枝一样的椭圆脸型，两条黑密的眉毛微微上翘，几乎要斜插进她那蓬松的鬓角；她有着象改枝那样一双圆圆的杏核眼，眼里滴露着安静和善良的光泽，睫毛每每眨动一下，都象是在思考和判断着什么问题。她在判断些什么呢？不知道。

到底是岁月不饶人了，山村的风霜雨雪，和繁重的劳动，给她眼角两旁刻下了几道浅浅的鱼尾纹，这也许是区别她和改枝的唯一标志；除此之外，无论从脸型和身段上去看，简直和她的大女儿浑然一体，没有任何差别。

她好象有意解释门口那副对联似的，拉着我妻子的一只手说：“俺那大丫头，是个民兵队长，头三天，人家就布置下来任务，要监视……哎，依俺这双眼珠子看，天底下哪儿来的那么多坏

人？”

“大嫂！”我妻子说，“我们并没介意。”

“你们不介意，俺心里可是结了个大疙瘩。丫头大了，俺也管不了她了。她那斗争的大理论，就象卖盆的进村——一套一套的，只有她爸爸能对付得了她。”

“她爸爸？”

“是呀！”房东大嫂笑了笑。“就是俺的他。你们城里人叫啥‘爱人’，俺叫不惯！”

我想起今天搬家时，在院子里只看见房东大嫂带着四位“千金”，一家五口都是女性，不禁插嘴问道：“大哥在哪儿工作？”

“在地底下。”

“地底下是什么意思？”我问。

“挖煤！四块石头中间夹着一块肉。”

我明白了，房东男主人也是个矿工——他在地方国营的一个矿山工作。

“俺们那口子，半个月才回来两天，常用拳头对付丫头那张嘴。”她把话题又扯回到改枝身上。“可是俺那丫头是属寒鸭的，宁可肉烂，嘴也不烂，你们慢慢就会知道俺这个家了。”

房东大嫂好象怕声音高了，惊醒了厉害丫头，侧耳听了一会儿，神情才恢复了常态。我们很理解大嫂的心，劝她早点回屋睡觉；她临走时，把蚊绳的火头吹了又吹，才迟迟疑疑地走了。走到门口时，再一次停步对我们说：“你们从大地方来的人，对我那个疯丫头，多包涵一点，我的眼皮就不再跳了，行吗？”

面对着她那双善良的目光，我的火气完全消失得干干净净，充满感激地对房东大嫂说：“我们有什么失检点的地方，大嫂你常常提醒我们一点。”

她摆摆手，指了指女儿的东厢房，意思是怕惊醒了女儿。然后，她悄悄地走到她住的北房，“吱呀”一下掩上了门。

一切都恢复了平静。我和她再也睡不着觉了，我俩坐在那只有一米二宽的窄炕上，透过那仅有的一小块玻璃，向外望着：月光如水，把一缕银白的光束照进小院，小院静谧得如高山幽谷，没有一点声息。只有院子中间葫芦架上翡翠般的绿叶，在夜风的吹拂下，发出轻微的沙沙声响……

“你以为只有我们心里不舒畅吗？”我妻子沉默了许久之后，唐突地说，“房东大嫂，不也等于是半个专政对象吗？”

“谁专她的政？”

“谁？她的女儿。”我妻子说，“不，准确一点说，是畸形的现实，畸形的政治！”

我们都不再说话了，静静地听着山村传来一长一短的鸡啼声……

二

是不是因为房东大嫂给我送来驱赶蚊子的蚊绳之故？我也说不太清楚。反正从这个晚上起，我们对这位房东大嫂发生了好感。

她很俭朴，象每个山旮旯的妇女一样，穿着补丁摞补丁的裤褂。每天，檐下那只花脖子公鸡啼过最后一声，准能听见院子的扫帚声。每每听见这个声音，我总是一跃而起，跑出屋子去抢她手中那把扫帚，她执拗地左闪右躲，不肯交出她手中的扫帚。

“大嫂，我劳动十几年了，您叫我来扫。”

“俺来。”她说，“你在井下挖煤（我在劳改煤矿当掘进工），俺

听改枝她爹说过，那是最累的活儿。”她仍然不交出扫帚。

这时，往往充当法官的是改枝，她从屋里窜出来，把两根细细的辫子往脑后一甩，双手插腰，训斥她的娘说：“你天生就是贱骨头。他们是啥东西？二劳改^①！油（右）派就象偷吃香油的耗子，喝咱们贫下中农骨髓里的油。这院子叫他们扫。”说着，一手夺过大嫂手中的扫帚，她大概不屑把扫帚直接递给我，便把扫帚往我面前的地上一扔，杏核眼里飞溅着火星子说，“以后，院子里的清扫任务都归你！”

“改枝，”房东大嫂嗫嚅地，“人家……”

“人家怎么？谁叫他住贫下中农的房子，贫下中农就有权利监督‘油派’改造。”

她说的天经地义，处处符合阶级斗争的条理，于是我拿起竹扫帚，我妻子拿出屋内扫地的高粱毛毛编成的小扫帚，每天早上打扫庭院。久而久之这就成了一个惯例。

老实说，对于改枝那双火辣辣的杏核眼，和扎人肺腑的语言，我们并无太大的反感。劳改队不但练就了我们一双结茧的手掌，也给我们的耳膜磨成一层老茧。按说一个改造人的灵魂的洗涤机构，它的成员应该是干练的；但在那个特殊年代，每年大批分配来的，却经常把优秀的留在省、市、区局里，而把一些不大称职的通通给劳改战线，好象清理社会垃圾的工作，什么人都行。因而，有的人瞪起眼来——比改枝这双杏核眼还要厉害得多、比改枝的话要犀利得不知多少倍呢！

使我们心情不安的倒是房东大嫂。她几乎每天晚上借改枝去开会的时候，或是更深之后，悄悄地走进我们这间小屋。有天

^① 二劳改是老乡对劳动就业人员的通称。

晚上，她坐在我们那条窄炕上，又来安慰我和我的妻子了。她愁锁着眉梢，连声长叹地对我们说：“俺这死丫头，小时候可仁义着哩！六一年闹灾荒，俺家吃粮上秤约，娃子一顿吃一个菜窝窝。可是，那年雁北来了个要饭花子，她把菜窝窝给了抱瓢的要饭老汉，饿得她夜里啃被窝角。这几年，俺那改枝真是女大十八变，变来变去变成个驴粪蛋子了，一开口就能臭倒人！”

“大嫂！”我的妻子说，“她并没做什么错事，贫下中农——”

大嫂拦住我妻子的话头说：“俺有句话不知道该问不该问？”

“男人劳改的，俺见的不少，女人……看看去你不象个坏人，咋就当了‘油’派？”

我妻子考虑着该怎么回答这个十分朴素而又诚恳的提问，因而略略沉吟了一会儿。

“你真偷了国家啥油料啦？芝麻？花生？”

我妻子摇摇头。

“那……当过国民党？”

“不，我十六岁参加共产党，往国民党警察局门缝塞过传单。被他们抓住后，看我个头太小，不象个共产党，打了四个耳光，又给放了。”

“那咋又进了共产党的大狱？”她把耳朵边一绺散发贴到耳根之上，不自觉地拉起我妻子一只手。

“怎么和大嫂说呢？打个比方吧！您生养了四个女儿，您这个当母亲的，难免有错打了您孩子的时候——我们就是当妈的打错了的孩子。”我妻子说得很轻松，还微微流露出一丝笑意。

可是房东大嫂却面色沉重，她那俊气的眼角里闪出晶莹的泪花，难过地揉着我妻子那只手说：“娘打孩子不过屁股蛋上留两个巴掌印，怎么能把心上的肉疙瘩，往大狱里推呢？！”

“大嫂！”我妻子还想说些什么，院门口有了重重的叩门声。我和妻子不禁闻声色变，可是房东大嫂安详地告诉我俩说：“用不着提心吊胆，叩门声这么响，不是那个死妮子，一准是俺的他回来了。”她站起身来，嘴角浮现出一丝笑纹，刚才噙在眼角的泪花流下她含笑的脸颊，就象朝露滚动在一朵山茶花瓣上。她用袖口沾了沾脸上的泪花，向我们解释说：“俺们那口子半个月回家两天，俺去给他炒俩鸡蛋、热壶酒去。”她轻轻地带上我们的房门，走了。

这位端庄、朴素、善良的大嫂侍候男人很殷勤，过半夜了，还能听到炒锅烹蛋的声音。我俩很体谅大嫂这颗心，第二天早上，我妻子一个人承包了清扫庭院的任务，我去摇辘轳绞水，首先给大嫂的厨房挑水。当我把最后一桶水倒进她家的水缸之后，东厢房的门“吱呀——”一声开了，改枝一边编着辫子，一边匆匆向厨房走来，她看见挑水的是我，而不是她爹时，惊愕地停下脚步，两只手本能地离开发辫，以致使编了半截的辫子，一下子都松散开来。她那两只野葡萄一样黑的圆杏核眼，审视地注视了我半天，然后走到水缸旁边看了看，以女法官的姿态冷冷地问道：

“为啥往俺家缸里担水。”

我想告诉她是为了叫大嫂多睡一会儿，转念一想，这不符合自己的身份，舌尖滚动了一下拐弯说：“加强劳动改造观点，为贫下中农多作点事。”

“谁叫你干的？”

“我自己。”

“你知道这儿是啥地方吗？”

“厨房。”

“这个哪？”她用食指指着水缸。

我有点奇怪了，回答说：“水缸！”

“这是进肚子的东西。”她两条眉毛飞了起来，带着高度敌情观念朝我尖声地喊着，“你帮助俺家挑水，是不是黄鼠狼给鸡拜年，没安好心？”

我手中的扁担一下落在地上。

“看你的脸，为啥变黄了？这水里一定有鬼！你马上给我挑走，挑你们水缸去！”她绷着那张桃花脸，对我下着命令。

我踌躇着。我的妻子不知什么时候进来的，她抄起水桶就往外淘水，显然，改枝过分的态度激起了“泥人”的泥性。她刚从缸里淘出一铁桶水，身后象是刮起十级旋风一样，我被一种突然的强力推倒在墙上，我妻子的手被一只青筋外突的大手掰开，还没容我们纳过闷来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，那一桶冷水“忽”地一下，都泼在改枝头上。一个脊背微驼的壮汉，一手猛地抓住改枝湿淋淋的头发，一手拿着一个海碗，从缸里淘了一碗水，猛地朝改枝嘴里灌去。改枝嚎叫着，拚命向外吐着水花，那情景就象一头不驯服的儿马蛋子，向外喷着灌进嘴里的汤药一样。到底这个壮汉比改枝力气大得多，任凭改枝摇头晃脑地向外喷吐，半碗凉水，还是被灌进了肚子。

这是在一瞬间发生的事情，等我和妻子从痴呆状态中清醒过来，事情已经完结。我不无惊奇地看看这个粗鲁汉子，他约摸有四十岁的光景，方脸膛，高颧骨，大眼睛。由于他极度的愤怒，眉毛压得紧挨着外凸的眼球。他双手插腰，胸膛起伏，对改枝霹雳闪电似地吼叫道：“死妮子，看你喝了缸里的井水，会不会伸腿瞪眼，进酆都城找阎王爷去报到！”

还用问吗？从这壮汉说话的口气，特别是从他那黑黑的眼窝上去推断，这就是一家之主——矿工牛大鹏。我望着这个半